

变硬的玫瑰依旧芬芳

杨阡

最后一抹阳光照在远处阿尔卑斯白色的雪山顶上，黑夜即将降临。在夜里不知道会有什么梦光顾我们，甜梦或噩梦？

离开“真理之山”——Monte Verità 之前，海蒂，这位八十九岁的老太太拥抱我和我告别。她是 19 世纪末流亡瑞士的一个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女儿。我看见湖蓝色的眼睛紧盯着我，然后她问了最后一句话：曾经的梦想已经死了吗？

地球乐园与真理之山

瑞士南部靠近意大利边境有两个风光旖旎山间湖泊——马焦磊湖 (Lago Maggiore) 和卢加诺湖 (Lago di Lugano)。湖畔分别有两个小城阿斯科纳(Ascona)和卢加诺(Lugano)。如今卢加诺变成了瑞士第三大金融中心，这座只有 6 万人的城市里据说有 4 万家银行，有人说全意大利的钱都存在卢加诺。欧洲中心这个中立而又安宁的小国，一直是全世界有钱人的保险柜，不管他们是王室还是军阀，犹太人还是纳粹，共产主义世界的官员还是跨国公司的老板。如果按照今天中国流行的价值观去看，卢加诺大概算是“地球乐园”了。恰好在瑞士真的有过一个“地球乐园”但不在卢加诺，而是它的邻居，阿斯科纳。

马焦磊湖上有一个被旅游手册称作“瑞士陆地最低点”的小岛——布里萨戈 (Isole di **Brissago**)。“岛上的植物园充满亚热带风光。”旅游手册是这样忽悠你的：“与瑞士通常的景致截然不同，在这里您能充分感受到一种真切的异域风情。”岛上异国情调的出现与一个俄国女子的落户相伴而来。这个名叫 Antonietta de Saint-Légerd 的女男爵 1885 年买下了这个岛并开始种植各种“异国风情”的亚热带植物，她把她的花园看作是“地球乐园”。事实上，当年女男爵设计和建立“地球乐园”的初衷，绝不像今天卖门票的主题公园这么浅薄。她看上这个地方，

是因为在不久前她和她丈夫访问了大名鼎鼎的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米哈伊尔·阿历克山大·巴枯宁 (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1873-1874 年，流亡在瑞士的巴枯宁在他的朋友卡尔洛·卡费罗 (Carlo Cafiero) 的资助下，在洛迦诺 (Locarno) 建立了全欧洲第一个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避难中心——巴罗纳塔 (La Baronata)。卡尔洛·卡费罗曾经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意大利的代理人，后来追随巴枯宁成为无政府主义革命者，他变卖了所有继承的遗产，支持在人间实现一个“没有人订规矩让另一个人服从”的巴枯宁式理想社会。

19 世纪末布里萨戈岛上的地球乐园，预示了后来出现在阿斯科纳附近所有的激进运动，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科学的还是艺术的。

1900 年，欧洲最早的女权主义领袖，钢琴家艾达·霍夫曼 (Ida Hofmann) 和最早的素食主义者亨利·奥伊顿克芬 (Henry Oedenkoven) 买下了阿斯科纳南面的一片叫“Monescia”的丘陵。他们计划在这里建立一个社区，进行一场“托尔斯泰式的”社会改革。他们把这片丘陵重又起了个名字叫：“Monte Verità”意为“真理之山”，借以荣耀自己探索真理的尝试。“Monte Verità”一直沿用至今，“真理之山”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梦想家和改革者来到这里，建立自己的营地，组织自己的社区，实践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20 世纪最初的 10 年到这里来的主要是一些社会改革者，有无政府主义者，如：来自俄国的彼得·克鲁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以及修正主义者，如：刚刚和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分手的前党主席卡尔·考茨基 (Karl Kautsky)。他们希望在残酷的资本主义和专政的社会主义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来自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埃里希·穆萨姆 (Erich Muehsam) 甚至希望阿斯科纳变成一个由“无家可归的人，流亡者和一无所有的人”组成的共和国。

第二个 10 年来的大多数是艺术家，像慕尼黑的“波希米亚”王后，号称“宇宙”女伯爵的弗朗西斯卡·祖·丽雯特罗 (Franziska zu Reventlow) 离开德国到阿斯科纳定居。通过她的日记，

我们知道她既是精通德、英、法、意大利语的作家兼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个妓女。显然 20 世纪初，在德国卖文是不能维持女性“独立”的。鲁道夫·冯·拉班(Rudolf von Laban)在这里创建了他的“艺术学校”。现代舞的第一批大师如：玛丽·魏格曼 (Mary Wigman)，卡特嘉·伍尔芙 (Katja Wulff)，苏珊娜·皮罗提特 (Suzanne Perrottet) 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当然作为创建者之一，伊莎朵拉·邓肯 (Isidora Duncan) 是少不了的。此后有许多的画家，作家和达达主义艺术家也纷纷来此寻找创作的灵感。像汉斯·阿尔普 (Hans Arp)，雨果·巴尔 (Hugo Ball) 等。

与此同时大批素食主义者和天体主义者，非传统医疗医生，新宗教学者，流浪诗人，以及来自全世界各地，形形色色激进的，非主流的，乌托邦梦想家和实践者一起涌入了这个海拔 500 米山丘。

从 20 年代到二战前，这里特殊的反主流文化也吸引了一些投资者，甚至前德皇威廉二世时期的一个银行家兼现代艺术收藏家，竟买下了 Monte Verità。

包豪斯的建筑师也看上了这里，他们设计了一些酒店。现在的还保留的 Monte Verità 酒店就是其中的一个，“从大都市 (苏黎世) 到大自然 (Monte Verità) 的品味”成了包豪斯最响亮的口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有钱的欧洲人纷纷逃离战火，前往美国。阿斯科纳开始衰落。二战后，湖边的阿斯科纳成了有钱的德国人度假的地方，而不远处的真理之山——Monte Verità 渐渐被淡忘成为遗址和废墟。

历史里的海玫瑰

这样草草的回顾历史只是为了勾连已经快要断裂的记忆。对于习惯遗忘或是有意制造遗忘的当代世界来说，遗址和废墟是不可避免的。与此相关，还有一大堆应该划入其中的东西，比如：匿名的残简断篇、破损的纹章徽记。老旧的玩具和尘封的八音盒等等。灰烬对爱

冥想的人是个绝好的对象，因为它有可能突然升腾起希望的圣火。Monte Verità——真理之山，对于我就是这样的地方。

4月里的一个下午，在海蒂的陪同下，我一直徜徉在 Monte Verità 草木丛生的山坡上，寻访那些共产—无政府主义者的小木屋，天体主义者的阳光浴场，素食主义者的菜园，非主流医疗探索者们的放射源小径，同性恋画家建造的爱人偶像殿堂……。我在吸取，深深地吸取这里每一寸土地上的气息。我沉浸，沉浸在淡淡的微醺里，空气中充满醉人的先驱们的窃窃私语。他们还在讨论，争辩着，为自己热烈的憧憬和神秘的激情。那些留在墙上，刻在树上或山间小路边石碑上优美而感人的只言片语：“你有权利选择拥有或放弃你的财产，同样有权利选择拥有或放弃你的国家”、“无政府即秩序，有政府是内战”、“是羞愧让人类穿上衣服，我们需要赢得足够的荣誉才能袒露全身”……，这些话分明还在讲述当年那些，不顾政治迫害，经济压力，文化歧视，行为习惯和文明准则的反对与指责，义无反顾地走向“真理之山”的动人故事。如今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我们或许还记得一两位“成功者”，比如：得诺贝尔奖的诗人、小说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我们已经忘了，像：弗洛伊德最早的一位学生，奥托·格罗斯（Otto Gross）。甚至连主流的精神分析与心理学历史都没有记载，但是他却启发了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以及后来的性解放运动。还有埃里希·穆萨姆（Erich Muehsam），一个被纳粹暗杀的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宣传家、剧作家、诗人。当代西方知识界一直在回避的不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而是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摧残。就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回避对托洛斯基主义者的迫害一样。凡是在根本上反对现有体制的人都被看作人类的敌人，而不是人类的希望。不过我并不想为他们鸣冤叫屈，因为不管是抗议还是大喊大叫要恢复历史真相，都不可避免地低估了事物的复杂性。让一切现象都变得清晰可见是人性中可以理解的愿望，但是能否具备洞穿世事的眼光则是另

一回事。这大概也是遗址和废墟的价值所在，因为你无法推断出像香奈儿对时尚女子的意义，或是劳斯莱斯对成功男人的映衬，在这里你必须有更强有力的想象力和更敏感的眼睛去挖掘细节，换句话说就是努力去理解——尤其是对“失败的纯粹与美感”(瓦尔特·本杰明谈卡夫卡语)的理解。

Monte Verità 是个对历史进行冥想的好地方。她本身是集神学、美学、达达主义、包豪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天体主义和素食主义的大杂烩，很难抽提出一种学说或运动。而且他们互相校正与平衡。正所谓“真理拒绝把自己纳入知识的范畴”(瓦尔特·本杰明《德国悲剧的起源》)。而今她更是已经从存在变成象征或更准确地说是寓言。而寓言总是能让已经死去的东西再活起来的魔术。

在 Monte Verità 短暂的寻访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到曾经是天体主义者举行拜日仪式的地方，现在这里立着一根“世界和平柱”，这个旨在祈祷和平免除暴力的“THE PEACE POLE PROJECT”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包括中国）被树立，在瑞士他们选择了这里。其实，如果这个“和平柱”放在日内瓦或是洛桑也是合适的，因为那里有联合国以及国际奥委会等许多体现和平的机构。而选择并不声名显赫于当代的 Monte Verità 却体现着另外的含义：质疑。她质疑我们的社会是否已经足够完美到可以享有“和平”？我们知道无政府主义者从来都不是和平主义者。因此在这里祈祷和平就是询问我们将如何缔造真正的和平。恰好在和平柱旁边有人种了一棵树，纪念因为反对普京和车臣战争而被暗杀的俄国女记者，作家和人权活动家安娜·斯蒂潘诺夫娜·波丽特科夫斯卡娅（Anna Stepanovna Politkovskaya）。2006年在莫斯科一个普通公寓电梯里的枪声成为 Monte Verità 最新出版的一个故事。

历史，在我看来并不是一条从高山上发源而后奔腾着流向大海的汹涌河流。它更像是大海，承载着全部人类，抑或是整个生命世界的苦难和挣扎的大海。在一望无际的沉默中，偶然我们看见了一两只玫瑰从乌有之乡而来，当我们捞起这些湿淋淋的美丽花朵时，希望的

芳香折磨得人心都快要碎了，于是我们再次鼓起勇气继续漂泊——也许在另一个时候我们自己也变成其他人从海中捞起的玫瑰。在这样的時候，我们要感谢人类中的那些有灵性的诗人，因为他们的诗句，我们才懂得怎样和大海交谈。

《海玫瑰》

玫瑰，海玫瑰，

被损伤的，花瓣稀落

柔弱、瘦小

没几片花瓣。

比一朵鲜花更可贵，

那孤立在枝头的。而你

是从漂流中捞来的。

难以长大的，只带几片叶子。

你被弃在沙上

又被随风翻滚的

沙浪举起。

香料玫瑰能吐出

你这样强烈的芳香吗？

它凝聚在你变硬了的花瓣里。¹

Monte Verità 正是这样一支海玫瑰。她的芳香宛如噩梦一样硬，诗一样真。

¹ H.D. (希尔达· 杜利特尔): Sea Rose 《海玫瑰》

Rose, harsh rose,
marred and with stint of petals,
meagre flower, thin,
sparse of leaf,
more precious
than a wet rose
single on a stem—
you are caught in the drift.
Stunted, with small leaf,
you are flung on the sand,
you are lifted
in the crisp sand
that drives in the wind.
can the spice rose
drip such acrid fragrance
hardened in a leaf?